

新冠疫情下的国际恐怖主义及其应对

祝晓燕 张吉军

摘要：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在各国疲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国际恐怖主义非但没有放弃或减少恐怖袭击活动，反而是利用此次疫情，重新部署力量，加大了组织宣传和招募成员的力度，预谋或已经在常住地实施了多起恐怖主义事件。从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现状来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恐怖主义组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恐怖分子开展活动产生了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国际恐怖势力反而利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开展活动。并且国际恐怖主义还有可能利用这场波及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制造混乱，袭击本已经遭受疫情创伤的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需注重研究个人在恐怖主义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了解恐怖组织信奉的意识形态和认识基础，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标本兼治，有效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恐怖主义。

关键词：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疫情时代；国际恐怖主义；“伊斯兰国”；国际反恐合作

收稿日期：2021-06-30

作者简介：祝晓燕（1976~），兰州文理学院教务处讲师；张吉军（1976~），兰州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文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政治伊斯兰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BZZ090）的阶段性成果。

2020年新年伊始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全世界遭遇的最大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同时，这场疫情也暴露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诸多问题，进一步加速了国际格局演变的步伐。从目前情况来看，确切预测新冠肺炎疫情结束的时间及造成的影响还为时尚早，在世界各国疲于应对新冠疫情和对恐怖主义有所放松警惕的大背景下，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并没有放弃或减少恐怖袭击活动，反而是抓住自身认为的“绝佳历史机

遇”，在疫情期间组织实施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国际恐怖组织在疫情期间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这场疫情会对国际反恐事业带来何种影响？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国际反恐事业的重点包括哪些方面？这是本文重点讨论的方面。

一、新冠疫情期间国际恐怖组织活动新动向

新冠病毒正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尽管有些国家在采取强力措施后，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找到治愈该病的特效疗法。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将抗击新冠肺炎病毒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萧条作为头等大事，国家安全和情报部门不可避免地将相当的注意力放在应对经济萧条必然带来的犯罪率增加和社会动荡等方面，而放松了对恐怖组织和安全管理，这也给恐怖组织以很好的喘息机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疫情期间恐怖组织的活动频次不减反增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大背景下，国际恐怖组织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不断增加活动频次，实施了更多恐怖袭击。据美国“军事时报”网站报道，极端政治伊斯兰组织“伊斯兰国”借助疫情扩散的“机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高级情报官称：“疫情暴发前，恐怖袭击每周至多一次，如今增长至少5倍，月均约达20次。”伊拉克情报部门认为，目前该国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达2500人至3000人，“还有约500名恐怖分子和越狱者近期从叙利亚来到伊拉克参与当地的恐怖活动”。^①伊拉克安全专家希沙姆·哈希米说，“伊斯兰国”发动袭击的频率已经超过以往，极端组织的成员正以人们遗弃的村庄为集结点，伺机向大城市发动袭击，而政府官员和基础设施常常被作为袭击的目标，目的就是在疫情暴发的同时制造恐慌的气氛。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所长丹尼尔·史密斯认为，新冠病毒将导致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欧洲国家、北非和西非的冲突加剧。

先看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活动。2020年3月7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Kolajo镇发动袭击，共造成2名“自由斗士”死亡，1人受伤。2020年3月9日，“伊斯兰国”袭击了哈利瓦军事机场附近的人民武装，造成2名士兵死亡，3人受伤。4月9日，“伊斯兰国”宣称对8天前在伊拉克发动的29次袭击、在叙利亚发动的11次袭击负责。同日，“伊斯兰国”对叙利亚东部胡姆斯省的苏赫奈镇发起大规模进攻，造成32名叙利亚士兵死亡。^②2020年5月1

^① 王权：《“伊斯兰国”恐袭不减反增》，中国军网、国防部网，http://www.81.cn/gfbmap100tent/2020-05/08/content_260725.htm。

^② 刘军宁：《“伊斯兰国”借助新冠疫情死灰复燃》，《世界民族热点》，2020年6月12日。

日，“伊斯兰国”武装发动了一场连夜袭击，造成10名伊拉克准军事组织成员死亡。也正是从2020年5月份以来，极端恐怖组织利用全球新冠疫情的“机遇”，大肆开展游击活动，通过夜间袭击、诡雷、绑架、设立假路障和自杀式炸弹等方式发起袭击活动。其突击队主要在伊拉克西部和北部的逊尼派省份、叙利亚东部以及叙伊600公里长边界沿线人迹罕至的山区地带活动。从2020年年初以来，已经制造超过430起袭击；4月份的袭击数量是1月份的两倍。

南亚国家巴基斯坦也是恐怖主义泛滥的地区之一，特别是信德省、俾路支省、开普省的部分恐怖主义组织的恐袭活动对地区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021年5月，巴基斯坦共发生恐怖袭击事件27起，较上月增加3起。袭击共造成47人死亡，66人受伤。其中针对安全人员的报复性袭击17起。

2021年6月，巴基斯坦共发生涉恐袭击29起，较上月增加2起。袭击共造成45人死亡，92人受伤。袭击发生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俾路支省及开普省，分别发生10起和9起涉恐类袭击。袭击手段主要为枪击和爆炸，分别发生18起和11起。巴基斯坦安全部门开展反恐专项行动8次，击毙恐怖分子14人，逮捕5名恐怖嫌疑人。共发生针对安全人员的报复性袭击13起，袭击过程中共造成23人丧生，18人受伤。共发生针对平民/公共基础设施的袭击16起，袭击共造成22人死亡，74人受伤。

2021年7月14日上午8时，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科伊斯坦地区发生出勤班车大爆炸，造成中国葛洲坝集团承建达苏水电站项目的9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死亡、30多人受伤。此次事件是极端恐怖组织策动的遥控炸弹袭击。值得重视的是，阿富汗塔利班利用美国及联军撤军之机，大举反攻。原来盘踞在阿富汗境内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残余势力又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越境渗透，其渗透方向有两个，一是俾路支省，一是开普省，后者更是巴塔和其他恐怖组织、极端武装组织盘踞的重要根据地以及恐袭活动的高发区。巴基斯坦恐袭事件的制造者主要有恐怖分子、地区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虽然近几年巴基斯坦政府的反恐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把恐怖主义势力压制下去。

2020年3月至5月底，非洲的“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在中西非和索马里实施了31次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约184人伤亡。

而在欧洲国家，随着新冠疫情的肆虐，“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发起的恐怖袭击活动频次也呈现上升的趋势。2020年4月以来，德国成功挫败了“伊斯兰国”袭击美国军事设施的阴谋，据称是由塔吉克斯坦武装分子策划实施的。英国一名摩洛哥公民因涉嫌策划袭击而被警察逮捕。“伊斯兰国”明确表示会抓住疫情的机会向欧洲发动更多的袭击，并号召其追随者也采取相同的活动。

自疫情暴发以来，“伊斯兰国”发动了针对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的恐怖袭击事件，还策划了针对大型医院的恐袭案件。

“伊斯兰国”组织在其“官方”杂志《纳巴报》的文章中指出，由于疫情的影响，欧洲国家的安全部门对打击“伊斯兰国”的关注度已经下降。“伊斯兰国”号召其成员应该以2015年的巴黎、2016年的布鲁塞尔和2017年的伦敦袭击事件为榜样，实施更多的恐怖袭击活动。

在阿富汗，“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KP）虽然在驻阿美军、阿安全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合力围剿下遭受重创，丢掉大量地盘，但是该组织却加大宣传力度，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实现了在阿富汗拓展生存空间的目标。仅阿富汗首都喀布尔5月6日的一场集会遭到袭击，就致使至少27人死亡、55人受伤。

（二）疫情期间恐怖组织的活动范围有所扩大

疫情暴发以来，国际恐怖组织发起恐袭事件的频次不断增加，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像地铁、机场、娱乐场所等往常人群集中的地方人员流动开始变得稀少，而像医院等医疗机构的人员开始密集，由此恐怖分子也开始将袭击的目标从之前的场所转向了后者。例如，2020年5月12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所公立医院的产科病房遭到“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多名新生儿、产妇和护士，以及一名警察死亡。同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楠格哈尔省库纳尔（Kunar）县的一场葬礼上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共造成32人死亡，133人受伤，死者中包括省议会议员。又如，极端政治伊斯兰组织会利用疫情期间相关国家降低安保级别的背景，对国家的象征性建筑如监狱、拘留所等地发动恐怖袭击，特别是制造紧张局势以乘机释放“伊斯兰囚犯”或“伊斯兰国”武装分子。^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恐怖组织不仅在叙伊等热点国家大肆开展活动，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通过发动恐怖袭击的方式不断强化自身的存在。在非洲，包括“基地”组织及相关分支机构、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国”等极端政治伊斯兰组织在该地区活动频繁。以博科圣地为例，近几年策动的暴乱造成数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不但对尼日利亚本国的安全稳定造成了威胁，还对乍得湖盆地周边国家造成了威胁。

丹史密斯在接受德国冯克媒体集团采访时说：“在遭受内战摧残的国家中，例如阿富汗，现在记录到大量感染病例，后果将是毁灭性的”“预计，在新冠病

^① Gary Ackerman and Hayley Peterson, “Terrorism and COVID-19: Actual and Potential Impacts,”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14, No.3, 2020, pp.59 ~ 73. 田嘉乐编译, <http://zgy.lzu.edu.cn/info/1080/3994.htm>, 2021-06-15.

毒危机期间，激进的伊斯兰运动塔利班将重新加强其地位。”^①截至目前，“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及国内的9个省份均有其势力范围，但其中较活跃的地区包括东部的楠格哈尔省、库纳尔省，北部的朱兹詹省、法里亚布省和巴达赫尚省，以及中部偏西的古尔省。在2020年2月29日阿富汗塔利班和美国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似乎已经扮演着继承塔利班“暴力搅局者”的角色。目前，“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已从10多个国家招募作战人员，包括巴基斯坦、印度、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等国。另外，还有很多“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战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这就意味着该组织除了搅乱阿富汗政局外，还有潜在破坏中亚地区安全稳定的能力。这也是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对中亚局势最为担忧的地方。

（三）疫情期间国际恐怖组织强化意识形态框架的宣传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造成了各国民众的恐慌，在这一大背景下，国际恐怖组织和极端分子却利用新冠肺炎传播速度快和具有致命性的特点进行恐怖袭击或威胁，这样不仅成本低，而且造成的大范围恐慌情绪更令各国难以防范。国际恐怖势力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对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特别是疫情造成的民众对现实生活的焦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开展“圣战”宣传和强化激进意识形态框架的宣传工作。“伊斯兰国”在其官方杂志《纳巴报》第220期中，将新冠疫情的全球性暴发视为真主对人类的惩罚，是“真主对异端和异教的愤怒”。它呼吁人们“忏悔”，为了躲避传染而进入“伊斯兰国”组织“避难”。^②《纳巴报》第225期题为《抗击疫情的伊斯兰纲领》的文章中提出“必须信仰真主，恳求免于疾病的庇护”的观点。^③“基地”组织则试图鼓励那些处于隔离、被孤立的人们皈依伊斯兰教。奥姆真理教就将当前的疫情视为末日的征兆或者神对人类广泛不满的一个迹象，因此可能催化他们对普通公众的暴力行为。逊尼派“圣战”分子声称新冠肺炎是伊斯兰教敌人的阴谋，是真主对腐败和无信仰者愤怒的表现，只有加强对“真正”的伊斯兰教的信仰，才能阻止新冠肺

^① 《SIPRI所长：新冠疫情将加剧一些国家现有冲突并加强恐怖组织地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2005121031427615/>，2020-05-12。

^② 艾哈迈德·贾迈勒·伯海里：《新冠病毒危机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影响》，《金字塔报》，<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P/4/365891/Opinion/Coronavirus-and-the-Islamic-State-group.aspxenglish.ahram.org.eg>。

^③ 艾哈迈德·贾迈勒·伯海里：《新冠病毒危机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影响》，《金字塔报》，<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P/4/365891/Opinion/Coronavirus-and-the-Islamic-State-group.aspxenglish.ahram.org.eg>。

炎疫情的蔓延。^①新冠疫情期间，恐怖组织在互联网上加大了激进思想的宣传。仅乌兹别克斯坦就有约8000名年轻人被国际恐怖组织招募为成员。该国著名专家维克多·米哈伊洛夫认为，在隔离和关闭国家边界的情况下，这支潜伏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军队”目前处于停止状态，但情况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②部分恐怖分子视疫情传播为绝佳“机遇”，认为时机成熟时应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视为世界末日的预言。

“伊斯兰国”利用阿富汗大量青年人失业的局面进行宣传，吸引贫困农民和失业青年加入其中。此外，“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据称拥有大批身经百战、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武装分子，并精通于“招兵买马”以及对阿富汗赤贫人口进行极端思想灌输。虽然作为一种外来势力，“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发展显现出一种水土不服的迹象，但是该组织却利用阿富汗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困难和各种社会力量大博弈逐步加剧的局面拓展组织发展的空间，而其发动的恐怖袭击更会进一步加剧本已经十分复杂和动荡的阿富汗政局状况。“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近期的野蛮袭击再次证明阿富汗及周边地区正面临着新的安全威胁，一个与塔利班相比影响力有限，但是复杂和暴力程度却更高的宗教极端组织正趁新冠肺炎暴发、肆虐的时机威胁着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都宣称这种传染性极强、致命的新冠病毒是上帝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惩罚，这种疾病本身就是“真主的战士”，病毒是“最小单位的士兵”^③。其中言论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引发的全球恐慌表达出幸灾乐祸的意味，并认为人们对于疫情的恐惧远超过疫情本身。^④因为新冠疫情的持续传播，加之全球感染人数越来越多，而截至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治愈这一疾病的疗法，使得很多人开始相信这种言论。疫情扩散导致的经济困难助推了上述宣传效应，而这也为国际恐怖组织的成员招募提供了便利。

随着交通、生物等技术的发展，恐怖分子利用新冠肺炎病毒进行生物恐怖袭击更为便捷，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不仅可能通过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病原体等多种途径发动袭击，还可能利用与新冠病毒扩散有关的公众恐惧煽动暴力、恐吓公

^① Gary Ackerman and Hayley Peterson, "Terrorism and COVID-19: Actual and Potential Impacts",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14, No.3, 2020, pp.59 ~ 63.田嘉乐编译, <http://zgy.lzu.edu.cn/info/1080/3994.htm>, 2021-06-15.

^②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应警惕“内部”激进分子》，<http://www.siluxgc.com>, 2021-06-22。

^③ 《恐怖组织发文称新冠病毒是上帝对美国的惩罚，正好可以榨干其经济》，腾讯网, <https://new.qq.com/omn/20200403/20200403A0EII900.htm>, 2020-04-03。

^④ 李壮、黄迪：《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应对策略》，《河北公安警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64-65页。

众、宣扬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可能利用其他病毒、细菌、毒素等生物武器进行袭击造成更多威胁，无论是否进行了实质性攻击，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人类的灾难都无疑是雪上加霜。^①

（四）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强化对网络的利用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利用互联网的隐蔽性、远程性和便捷性，在互联网空间渲染恐慌情绪，传播恐怖信息，协调恐怖袭击活动，最终实现与现实空间发动恐怖活动同样的目的。由于“伊斯兰国”实际控制的领土逐渐缩小，恐怖组织和个人不得不再次求助于网络，在网络空间频繁活动来提振人员的士气，并实现招募更多成员的目的。此外，在疫情期间由于减少病毒传播的需要，世界各地纷纷采取限制出行、停工停课等措施，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世界各国人员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大幅上升。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疫情期间正是恐怖分子进行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的“有利”时机。^②

一名伊拉克安全专家指出：“他们重新建立了一些社交媒体账户，规避Facebook和Twitter的自动检测，并发布更多的视频和图片。”“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利用新冠疫情下互联网公司减少干预活动的契机，恢复了在Telegram上的部分影响力。^③同时，“伊斯兰国”还转战其他社交媒体，如Hoop，建立数个官方账户并发布讯息，“‘伊斯兰国’的支持者经常在Telegram上分享他们的Hoop频道链接”。^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过去传统的信息化应用模式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而国际恐怖主义也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络信息的全球性、共享性、便捷性、开放性和即时性等特点，将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活动充分结合，实现了两者的结合。

近年来，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组织，通过非法手段掌控网络社群媒体，运用网络社交平台在虚拟空间“线上”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宣扬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思想、传授制枪制爆以及恐怖袭击等犯罪方法，煽动实施爆炸、暗杀、投毒和自杀式袭击等恐怖活动音视频。^⑤通过网络发布血腥视频，不

^① 李壮、黄迪：《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应对策略》，《河北公安警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65页。

^② 李壮、黄迪：《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应对策略》，《河北公安警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65页。

^③ Telegram一直是“伊斯兰国”发布官方出版物的主要平台。在2019年底账户被封，但最近几周出现了数十个新的账户。

^④ 刘军宁：《“伊斯兰国”借助新冠疫情死灰复燃》，《世界民族热点》，2020年6月12日。

^⑤ 李恒：《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现实表现、风险挑战与政策治理》，《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57页。

仅能达到制造民众的心理恐慌、炫耀实力、吸引世界关注，给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施加压力的目的，甚至还起到妖言惑众、挑起事端、激化矛盾的作用。^①

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新冠疫情期间实力发展的原因分析

2020年新年以来，国际恐怖组织在疫情时期通过增加活动频次、扩大活动范围、加强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等一系列措施不断强化自身的存在，借助新冠肺炎病毒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这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疫情时期国际恐怖主义在全世界的扩散进行分析，可以为“后疫情时代”国际恐怖主义治理提供清晰的思路。

（一）疫情期间的“安全困境”为恐怖分子开展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个体因素是分析恐怖主义活动产生的一个变量。对个人在恐怖主义生成和发展方面所扮演角色的研究分析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体选择参与恐怖活动的原因，例如倾向性的人格；二是导致个体选择参与恐怖活动的外部因素。从第一个方面来讲，个人心理是个体加入恐怖组织的重要因素。人们普遍认为，杀害无辜平民实际上是有悖于所有法律、宗教传统的，由此导致恐怖行径的根源就是潜在恐怖分子的理智失衡。^②现有研究表明，参与恐怖活动的成员中具有心理异常现象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决定恐怖分子铤而走险，采取暴力极端行为的原因往往是缘于对组织的效忠或寻求某种归属感。加入恐怖组织前，某些个体的行为特征与正常人并没有差别，反而是加入组织后发展了自身的人格特征。

从整体来看，“伊斯兰国”的生成国及其扩散到的国家和地区大多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即从传统落后的不发达社会向先进发达的现代社会过渡的剧烈变革时期，或是刚刚经历了战乱或国家根本制度的转型时期，这是一个长期且痛苦的过程，无论是所在国家还是民众都会面临来自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困扰，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会对政府的施政带来制约和挑战。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必将引发权威国家政权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而这种矛盾和冲突会加剧民众的失望情绪，造成的“安全困境”更会引发民众巨大的心理焦虑和不满。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传播和感染者人数的不断增加，“伊斯兰国”生成国的很多人可能已经开始对该组织宣称“真主对异端和异教的愤怒”的宣传将信将疑了。网络上有视频及推特上的宣传称这种病毒是一种天罚，而这种宣传在麻

^① 潘新睿：《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制裁思路》，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36页。

^② 奥德利·库尔思·克罗宁、詹姆斯·M. 卢德斯著，胡激、李莎、耿凌楠译：《反恐大战略：美国如何打击恐怖主义》，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痹民众的同时，也为“伊斯兰国”招募成员提供了借口。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有可能会影响恐怖组织的行动力，特别是对中亚、南亚和中东等国的“伊斯兰国”分子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恐怖分子也害怕被感染后去医院治疗时被发现和逮捕，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恐怖组织的行动力和组织架构。当然，这种影响非常有限，因为中东、西亚、北非等大多是偏远的沙漠地区，远离人口疫情聚集区，这种生活状态决定了他们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可能性很低。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病毒引发的民众迷信和恐慌情绪，有可能助长极端恐怖组织招兵买马，加紧重整旗鼓，比疫情发生之前制造更多的恐怖袭击。

极端组织在疫情期间发动恐怖袭击活动既具有针对性又具有随意性。为了扩大组织的影响力和传播其极端意识形态，恐怖组织的袭击目标具有针对性，一般会选择国家政府机构、执法机关，在特定的时间点和地点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更大。而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民众普遍具有恐慌情绪的情况下，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则会利用疫情发动针对特定族裔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区发起煽动暴力和恐吓公众的暴力行为，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二）疫情为恐怖组织开展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时间和空间条件

团体或组织的动态变化是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猖獗的第二个考量因素。从本质上来讲，恐怖主义组织是一种组织或团体行为，因此，有必要了解组织信奉的意识形态或共同的认同基础，而上述两种因素不仅是恐怖主义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更是恐怖主义组织生成的必要条件。疫情时期，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强化内部动力和信仰体系的建构，由此也进一步促成了暴力恐怖活动的升级。

在遭到所在国家军事打击或遭遇此次严重疫情的大背景下，国际恐怖组织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各种灵活性的措施。如“基地”组织在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后，并没有完全被瓦解，而是依靠自身超强的自治能力和恢复能力，在世界热点国家和地区不断显示着自身的存在。

世界各国政府都将抗击新冠病毒及其带来的经济大萧条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情报和安全部门自然要在应对经济社会萧条带来的社会动荡风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将导致投入打击恐怖极端组织的人力和财力方面的资源相对减少。从而为国际恐怖组织提供可乘之机。这种情况在“伊斯兰国”的生成国如此，在其遭到致命打击后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渗透目标国家更是如此。

借助推特等现代媒体的力量，“伊斯兰国”在控制区大量宣传，其发展势头非但没有因为新冠疫情而弱化，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由于国际恐怖主义在许多贫穷落后的地区本来就有其发展扩散的土壤，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民众生活更加的艰难，更易受到极端分子蛊惑，也更容易投入恐怖主义的怀抱。正如圣

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中亚和中东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克尼亚泽夫说，就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而言，有些地方生活水平比较高，有些地方生活水平比较低，这完全取决于政府机构如何高效提高公民生活质量和整个社会经济环境。^①尽管出生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加入恐怖组织并不罕见，但是大部分激进分子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不被重视，努力寻找社会公平的人，这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宣传和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的内部问题，比如薄弱的社会政策才是年轻人加入恐怖组织的主要原因。随着有限资源更多投向了防疫领域，对反恐的投入势必受到一定影响，且跨国反恐合作必然受到一定阻碍，恐怖组织活动有可能更加肆无忌惮。

而就“伊斯兰国”的生成国伊拉克和叙利亚而言，疫情更是对反恐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据报道，负责伊拉克安全防务事务的安全部队和政府军人员减少了一半，并且工作重点只能放在主干道，而小城镇和村庄道路成为安全盲点。伊拉克安全部队大部分成员已将注意力从“伊斯兰国”身上移开，忙于督办防疫“禁足令”的执行。大部分警察因为担心感染新冠肺炎而不再上街执勤。美国战争研究所研究员尼古拉斯·埃拉斯指出，“伊斯兰国”也已在人口密集区掌握了足够的本地网络，“使其可以在理想的时间，也越来越可以在理想的地点发动袭击，并且使用更大的暴力”。^②

（三）疫情时期国家的治理水平低下是恐怖主义组织发展的内部条件

从国家的视角分析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从国家内部治理水平高低，或是“失败国家”是恐怖主义生成、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进行分析论证。这是目前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恐怖组织在叙伊两国生成，而在遭遇美国军事力量的打击后，剩余力量又选择前往中南亚、阿富汗作为据点，图谋东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也是“基地”组织选择阿富汗或苏丹作为其活动总部的原因。正是在这些“失败国家”的民众更易受到恐怖分子的蛊惑，成为后者潜在的招募对象。

以非洲国家为例，因为土地广袤、整体经济发展落后和复杂的民族宗教等原因，非洲地区滋生了众多的恐怖组织，随着疫情的暴发和全球恐怖主义的复苏，非洲国家成为国际性恐怖组织竞相争夺和发展蔓延的重要阵地。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非洲国家将本已经有限的财政支出更多用于维护社会稳定和防疫抗疫方面，军队和警察等政府强力部门也被派往疫情防控一线，政府在反恐的财力和物力方面的投入下降也给了恐怖组织趁乱做大的

^①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应警惕“内部”激进分子》，中亚科技服务中心，<http://www.zykjtwz.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849&id=5117,2021-06-23>。

^② 《德媒：“伊斯兰国”恐怖活动卷土重来》，新华网，<http://news.cnfol.com/guojicajing/20200514/28144614.shtml>，2020-05-14。

空间和时间。二是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给非洲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疫情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民众需求疲软。非洲国家的货物贸易和航空运输等都大受影响。另外，受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中断，导致本已经疲弱的非洲国家制造业大面积遭受重创。据《2020年非洲经济展望补充报告》显示，疫情使非洲新增2820~4920万日均收入低于1.9美元的极度贫困人口，以及2500~3000万失业人口。疫情还加重了非洲国家的粮食危机，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新冠疫情加剧了非洲国家的失业和贫穷问题，社会中的部分流离失所者遂成为恐怖组织补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国家防疫物资和食品短缺，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疫情进一步放大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加剧了社会动荡。

在叙利亚，因为疫情的原因，大量的安全警察被安排上街执行任务，由此导致反恐力量趋于分散，恐怖分子的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言人表示：“有时连执行防疫巡逻任务的警察都会遭到打击，因为他们大多携带防疫装备，自卫火力严重不足。”^①

（四）疫情对反恐国际合作的“阻挠”是恐怖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

国际体系与恐怖主义的生成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一方面，全球恐怖主义组织因为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而确定了新的目标，也就是通过这一途径而协调和实施恐怖暴力行为。因此现代恐怖主义的目的和手段都受到了全球体系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恐怖主义也是国际格局体系下，各国间不断扩大的差距的产物。恐怖主义是国际权力分配中更广泛历史变化的所有形式——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文化——的副产品，这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力量的表征是相同的。在国际巨变之际，人们尤其是那些没有从变化中获益——或者受益不够多、不够快的人们，抓紧替代手段来控制和理解他们的环境。^②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面临的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危机，在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恐慌的同时，也给经济欠发达和现代化处于较低水平的国家带来致命的后果。当前国际社会非但没有形成“世界抗疫统一战线”，反而陷入了越来越多相互责怪和“甩锅”的局面，甚至有人惊呼全球化逆转和整个世界秩序坍塌。^③国际恐怖组织利用病毒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恐慌情绪进行恐怖威胁，

^① 《疫情期间“伊斯兰国”恐袭不减反增》，《中国国防报》，<http://shareapp.cyol.com/cmsfile/News/202005/08/web377082.html>，2020-05-09。

^② 奥德利·库尔思·克罗宁、詹姆斯·M. 卢德斯著，胡激、李莎、耿凌楠译：《反恐大战略：美国如何打击恐怖主义》，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③ 赵可金：《新冠疫情凸显全球治理困境》，《参考消息》，2020年7月2日，第11版。

这样造成恐慌情绪的效果更甚，而且采取这一行动的成本还更低。

受疫情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海外的驻军人数有所减少。伊拉克境内负责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和负责伊拉克政府军训练的联军特种作战部队在疫情发生后也宣布停止作战训练，并准备从尼尼微省、基尔库克省等地的多个基地撤离，而法国、德国等国军队在疫情期间纷纷撤出驻伊拉克的武装力量。有资料显示，“伊斯兰国”过去几个月在伊拉克境内发起的袭击日益频繁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这与新冠疫情暴发的时间基本吻合。此外，恐怖分子活动频繁与美军及其盟友开始撤离伊拉克更是关系紧密。恐怖组织也瞅准了这一时机，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活动。之前，伊拉克军队开展反恐行动过于依赖美军的援助，现在伊拉克开始和亲伊朗的民兵武装“人民动员部队”展开合作，这也与伊朗将军苏莱曼尼被暗杀后两国的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有关。

国际极端恐怖势力利用疫情期间不少多边反恐机制会议取消或推迟，国际反恐合作受到不同程度干扰的“机遇”，积极地转战网络，继续大肆宣扬伊斯兰极端宗教思想，鼓动并策划开展恐怖袭击活动。“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东伊运”等国际恐怖组织都在加大活动的力度，有极端恐怖组织甚至鼓动发动生化袭击。

非洲萨勒赫、中东、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恐怖活动热点地区丝毫没有出现退烧退热的迹象。特别是萨勒赫地区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部族仇杀、民族矛盾、民生问题与资源争夺等问题相互交织，解决的复杂性较高。中东、中亚热点地区，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热点国家的恐怖主义形势依旧严峻。上述国家政治和解进程缓慢、宗教派别林立，导致政府管控能力和治理水平本来非常有限，而美国等北约国家军事力量的撤出对当地的安全形势无疑是雪上加霜。美国聚焦大国战略竞争，为了自身的利益大幅缩减反恐资源投入，接连抛弃曾经的反恐盟友，致使现今的反恐国际合作困难重重。

同时，疫情期间恐怖分子也会针对反恐应急能力相对有限的国家和地区发动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在美英等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不断打压“伊斯兰国”的生存空间，极端组织向中南亚等国的扩散，各国加大了对“回流”恐怖分子打击力度的背景下，极端势力或许会选择管控较为松散国家和地区实施行动，这有可能也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际恐怖活动较难防范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反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有相当数量的非洲裔“圣战”分子向西非和北非地区回流。这些地区的恐怖分子经常为了争夺地区控制权发生武装冲突。例如，2020年12月15日，“伊斯兰国”与“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马里北部地区再次发生武装冲突，造成大量民众伤亡。

三、“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思考

世界各国持续不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且各国“带疫解封”后的疫情反弹的风险依旧持续存在。2020年以来，斯里兰卡、埃及、吉尔吉斯斯坦、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和地区先后推迟举行总统、议会、地方政府和全民公投等各类投票。潜在的政权更替或引发局部动荡，国内紧张局势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由于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积累和地缘政治变迁带来的风险显著升高，各国社会安全风险持续加剧。相关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安全风险、政治稳定性风险、国际关系风险、社会公共治安风险、恐怖主义风险、民族宗教文化风险、法律与合规风险等。

（一）注重研究个人在恐怖主义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标本兼治应对恐怖主义

从个体的角度来讲，特定的环境是造成或促使个人选择加入暴恐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两者之间并不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诸如贫富差距、缺乏教育等都会成为部分民众加入恐怖组织的影响因素。环境和社会制度等客观条件与恐怖主义组织的发展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如个人在政治、社会、物质等层面的诉求与获得之间的差距是导致这些个人加入恐怖组织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除了强力打击之外，还应该在帮助和支持当地教育事业方面下功夫，引导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社会创造性事业中。

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在网络上的延伸，是恐怖主义组织和人员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通过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将恐怖主义与互联网相结合的产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恐怖主义势力通过互联网组织策划和指挥恐怖袭击，传播散布暴力恐怖信息，比疫情暴发之前更多地将互联网和恐怖暴力行动结合了起来。极端政治伊斯兰势力可能会借助网络来传播普通民众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的不满情绪以寻求对自身活动的支持。因此，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国际恐怖主义治理在强化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同时，要更加严格防范恐怖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在网络上的传播，避免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可以避免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信仰危机，阻止恐怖主义借助疫情扩大组织规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的残酷现实，国际反恐合作应该关注对网络恐怖主义的管控和治理。相关网络管理部门应灵活应用人力和智能系统进行网络型的搜集、分析和研判，实时追踪涉及恐怖暴力和极端恐怖主义的负面信息，探究各种恐怖主义信息的源头，及时做好预判和应急管理工作，力争在恐怖主义组织实施暴力犯罪前将其控制在萌芽状态。

同时，大力提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在国际反恐工作中的

应用效能，实现对恐怖主义组织和人员的智能化筛查工作，努力在其采取行动前对其采取强制措施，防患于未然。因为信息通过网络传播的速度呈现指数级的增长，如果能够提前掌握此类信息的源头，对阻止爆恐事件的发生和抑制恐怖主义组织的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之，将尖端的人工智能科技应用于反恐领域，努力将暴恐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让恐怖分子无处遁形，将是新冠疫情下国际反恐合作的重要内容。

在反恐工作中还应该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对高喊“公平”“公正”口号，以血腥暴力手段要挟威逼本国政府或威胁恐吓本国民众的顽固的恐怖组织进行坚决打击。极端暴力行为是对国际规制和世界文明的挑战，各国政府、学界和媒体都应该担负起反恐的义务和责任，齐心协力遏制暴力恐怖主义的蔓延。另外，也不能仅仅依靠单纯的打击手段，而要进一步加深对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了解，以宗教对话的形式纠正极端分子的误解。就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而言，社会公正是相对的，对不公正现象应该通过呼吁和制度调整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恐怖组织不能以社会“不公正”为由实施殃及无辜民众和设施的恐怖暴力行动。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国在加大严厉打击恐怖暴力极端行为的同时，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因国家治理过程中制度安排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和贫困现象，解决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二）了解恐怖组织信奉的意识形态和认同基础，有的放矢打击恐怖主义

意识形态框架和共同的认同基础是恐怖主义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了解组织及其运作方式就会成为反恐的有效手段。同新冠疫情前的恐怖主义一样，各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极端暴力恐怖活动仅仅是其表象。根治恐怖主义的“解决之道，应当是标本兼治，既要坚决反对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又必须重视铲除产生极端主义思想情绪的土壤，通过公正合理或缓解中东地区日趋尖锐、激烈的主要矛盾，以努力营造孤立、遏制乃至消除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客观条件”。^①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具有的不平衡性，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现象，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国家之间的鸿沟也有不断扩展的趋势。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中东、中亚、南亚和西亚等国家被边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新冠肺炎的全球扩散已经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疫情对各国影响不同，对国际关系的结构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依旧处于蔓延变化之中，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到目前为止还难以确定，实际情况或许比上述预

^① 朱威烈：《伊斯兰文明与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

测还要悲观。

因各国文化、习惯、传统和历史等不同，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反恐怖斗争中，人们往往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减少恐怖活动的现实危害方面，而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问题认识不足。虽然各国采取了种种措施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威胁，但事实上要想彻底根除还需要一个过程。只要经济、人类安全、教育、政治冲突和收入差距等问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地区国家就将会持续处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中。正是冲突、战争使得已经或正在走向失败的国家的权力真空给极端组织提供庇护的场所，同时也很大概率上实现了上述组织自身升级和扩张。虽然恐怖主义的生成和发展与社会经济问题没有正相关的关系，但是正是因为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和社会服务，使得恐怖组织可以利用这一真空为当地民众提供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服务和商品。有些恐怖组织在这一进程中反而是放大了政府的弱点而借势兴起，而部分失败国家的高压统治又会放大这些因素。

（三）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效遏制恐怖组织的发展

改善国家的治理水平和社会发展条件，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是遏制恐怖主义发展的必要手段。世界局势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严峻是恐怖主义事件暴发的最主要根源。社会矛盾导致的意识形态被极端化才是恐怖主义的本质，它与宗教思想、政治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本身无太大的关系。缓解甚或消除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平衡是反恐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也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应该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通过援助恐怖主义事件多发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问题，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提高接受现代国民教育的水平，尊重各国文明多样性特征，提升多元文化的认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不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责任，也是其他地区性大国的责任。

在反恐问题上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一方面要对危害社会安全和妄图分裂国家的暴恐组织予以强力打击，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从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无论是在抗疫还是反恐方面，都要高度重视国际合作，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倡导多边主义。在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合作反恐，这样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果。正如彼得法姆所指出的：“除非有一套较为完整的，以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更广泛的人类安全概念为基础，而且还超越非洲陆地上一切实体边界的解决方案，否则非

洲恐怖主义威胁便无法消除。”^①而反观西方国家20多年来的国际反恐经验和教训，采取双标反恐和选择性反恐，以一己之私，全然不顾既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其结果是越反越恐，不但原有的恐怖组织发展没得到遏制，反而产生了新的恐怖组织，在部分地区造成了难民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使整个世界深受其害。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无论对于抗疫还是反恐，其道理都是相通的。

（四）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

极端势力利用疫情期间各国工作重点放在防疫的“机遇”，谋划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活动。面对国际反恐面临的挑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各国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不能只依靠一个国家和地区单独完成防范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任务。此次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也向世界各国显示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性和严峻性。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和恐怖主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是各国军队、政府和情报人员的管辖范围，其他领域的人员对此类问题也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地区国家特别是小国来说，包括领土争端和军事入侵等在内的传统安全威胁已经不是最紧迫的威胁，而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和“颜色革命”导致的社会失序才是最为现实的威胁。新冠疫情的大范围传播所暴露出的各国公共卫生系统的脆弱性和全球治理水平的现状，会使极端政治伊斯兰分子利用国际政治行为体应对疫情传播的滞后性，有可能将致命性生物制剂作为恐怖袭击的武器。这种恐怖袭击方式或许比常规手段更能对普通民众造成伤害。

各国应该采取更加全面和综合的手段应对新冠肺炎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加强与周边国家特别是受恐怖主义侵害的热点国家之间的反恐合作，通过建设国际恐怖主义预防、预警和情报交流机制，有效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以更好地实现切断恐怖组织融资渠道，阻断人员往来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目的。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极端组织非但没有收缩实力，反而表现出一些新形势和新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聚焦于本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大幅缩减反恐资源投入，接连抛弃曾经的反恐盟友，致使国际反恐困难重重。相关国家在国际反恐问题上缺乏乘胜追穷寇的定力和担当，没有诛暴和治乱的连贯思路，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最终可能会导致在反恐问题上前功尽弃或相互拆台的局面。从国际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现状来看，恐怖主义的产生与霸权主义、各种社会问题和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不无关系。同时，恐怖主义要比其他类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大。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传染性疾

^① Peter Pham, “20 years after the Embassy Bombings. The Long War in Africa,” 张童沿编译，《恐怖主义在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圣战”思想的兴起》，《大译编参》，2021年第19期。

威胁。而在新兴技术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恐怖分子采取网上与线下勾结，境内与境外沟通的方式，实现了极端思想的网络传播和暴恐技术快速扩散的结合，威胁的广度和深度更大。国际恐怖主义呈现有可能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合的趋势。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或独立应对，国际反恐亟须凝聚共识，协调应对，形成合力。

在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反恐国际合作中，联合国无疑还是现有国际合作平台中最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国际组织。^①各国应该在联合国的框架下，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谈判和对话，在反恐理念、法制、体制、措施和具体工作信息方面加强沟通和交流。例如在反恐情报共享方面，联合国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推动相关体制机制的建立。对我们而言，要在不断提高自身反恐能力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国际反恐怖主义合作的新途径，积极开展国际反恐怖主义合作。我们要充分发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反恐磋商合作机制在国际反恐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构筑国家反恐安全屏障。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必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国际恐怖主义带来深远的影响。讨论国际恐怖主义及其应对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因为疫情原因，各国对反恐的关注度必将下降，但各国应正确应对疫情时代国际恐怖主义带来的系统风险。新冠疫情对极端组织的活动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各国必将面临一个漫长的经济复苏时期，例如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等负面影响必将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年轻人失业和对未来前途渺茫的焦虑情绪等问题必将为恐怖分子带来政治机会，年轻人也会将加入恐怖组织作为一种选择，国际反恐也必将面临资源短缺的情况。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国际反恐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各国在严防疫情扩散的同时还需要继续加大反恐的力度。希望通过个体、团体、国家和国际体系四个层面的分析，进一步深化对疫情时代恐怖主义发生规律和特点的认知，协调各国的立场，为反恐国际合作提供切实可行的着力点，最终为各国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李丽]

^① 王爱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